

# 城镇人口首超农村预示着什么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首超农村(1月17日新华网)。

一般来说,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发达程度。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城市化、城镇化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标志。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取得辉煌成绩,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和关键期。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度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来得仍然较迟。

世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在2007年5月23日。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为33.3992253亿人,农村为33.3866404亿人,中国比世界迟到三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在1920年9月13日,中国比美国迟到90多年。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与自己比非常兴奋,很值得庆贺,但是与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对比,差距仍然很大。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结构来衡量发达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只相当于美国1920年的水平。还确实不值得过度兴奋。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要防止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方面城市城镇化快速扩张,而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过度涌向城市城镇造成住房短缺、价格飞涨;造成交通拥挤、城市拥堵;造成城市污染、没有洁净水和新鲜空气。更加严重的是,就业压力增大,贫富悬殊扩大,失业失业人员增加,社会闲散人员剧增,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世界人口结构在2007年城市超过农村时,全球约10亿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基本生活条件未得到满足,例如没有洁净水、没有厕所、没有坚固的房屋栖身。而另一端是农村出产自然资源、食物、水、木材等生活必需品,但随着城镇化的扩大,城镇从农村获得好东西,还给农村的只有污染物。农村被污染,农村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以下的增多。

这是中国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的。中国13亿人口,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困难更大、问题会更多。这些问题这几年已经开始有所暴露。两个凸现问题是:首先,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各种资源短缺紧张现象开始显现,城市就业难、入学入托难、养老难、住房价格畸高造成的住房难等多难问题出现。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不健全,物价高企造成的生活负担加重等困难,使得城市低收入阶层开始急剧扩大,贫民窟现象不同程度地出现。

其次,有1.6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采矿、建筑、钢铁、有色金属、纺织和机械工业,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城镇的服务业,包括环卫、家政等,很多都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仅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却游离于城市各项待遇之外,在物质、生活生存保障待遇上更是“低人一等”。技能培训不足、维权力度不够,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保障不到位。工资常常被拖欠、工作时间长待遇低、人身常常遭受歧视,而且维权难度异常之大。在城市务工十年八载,却没有医疗保障、养老更无着落、子女教育异常头痛,面对城市的畸高房价只有望房兴叹。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二等公民”。

因此,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提醒我们,一方面一定要防止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大军”。一定要扎扎实实发展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使得城市化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解决就业能力相匹配,防止拔苗助长。另一方面应该尽快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使得已经在城市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从各项待遇上成为城市人,推进城市化城镇化进程。

余丰慧

# 这样的明码实价规定具有普适性

如果再有企业商家促销赠送“价值80元的毛巾一盒”,你可以不要那质量其实很差的毛巾,而是直接要80元现金。

从去年征求意见开始就备受关注的《江苏省明码实价规定(试行)》正式出炉。新规不仅叫停商业促销“返券”行为,还规定了买赠活动中,不要赠品的,商家必须退还给消费者。考虑到新规刚一实施,省物价局给予了一年过渡期,2013年元旦前重点在大中型商场、连锁企业全面实施。(1月13日《扬子晚报》)

做买卖,就要讲究公平。俗话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在一般情况下,生意人的思维,总是从自己已有的预设出发,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总是为自己想得更多,很少设身处地从消费者出发考虑问题。即便是送赠品,也多是一种促销行为,目的是使东西好卖,卖得快些。顾客到商场买东西,得到赠品往往不太在意其质量问题。有时,一些消费者还油然而升起占了便宜的错位心理。公道不公道,商家心里最清楚。

商家没有卖家精。商业促销就是商业促销,是商家的一种策略性的行为,消费者得点儿小好处,商家就会得到大好处,不会让消费者白白便宜。江苏省试行的明码实价规定,是在规范市场行为,它对消费者有利,同时,对商家也是公平的。

对新规作一番解读,就会知道,叫停“返券”促销,包括电子券等均属违规行为,其公平意味是:想赠送可以,但商家得赠送实物商品或者现金。一些商场喊着“买100送200”,听着很好听,但细看上去却不是很美,因为其商品的水分不言而喻。叫停返券就是为了让商家实实在在地让利消费者,而不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新规中有一些明确针对商家虚假让利,规定实行赠品促销的,商家应标明赠送商品的价值或价格或者积分值,如果消费者不愿意接受赠品,经营者必须按照其标示的赠品价值直接折现。这样做,还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为了让商家诚信经营。商家说得到,就要做得到,商家不愿意赠赠品,赠品又物有所值,商家直接折现,理论上讲,双方都不吃亏。赠品如若不是残次品,商家承担这种后果,亦是理所应当。

买卖人无论做什么生意,面对消费者,都是在做良心。大小生意都应是“童叟无欺”,都不能让一些讨价还价能力弱的消费者当冤大头。保护商家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公权力,在他们彼此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所做的裁判角色。裁判做得公平公正,得益的除了商家和消费者,还事关整个社会。应当说,江苏省这个明码实价规定,具有普适性,其他地方皆可见贤思齐。一旦全社会都形成了明码实价的风气,商家必然也会慢慢接受诚信经营的理念。而且,明码实价规定可操作性强,操作起来,既可在短期取得实效,又可形成长期散发效应。

伊文

# 春节安全重于泰山

马上就到一年一度的春节了。除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安宁之外,就是安全问题。安全重于泰山。

第一是交通安全。春运以来,由于有关部门动员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早早作了部署,尽管在售票、进站乘车等环节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说,还比较平稳,为过好2012这个安全春节、文明春节开了好头。

正是这样的一种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氛围,使得道路交通安全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较大的恶性交通事故。但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近日,南方一直弥漫着小雨,天色阴沉,雾气蒙蒙,如果不格外重视,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随时都有可能酿成恶劣的后果,使得前期的谨慎、努力毁于一旦。

比较可行的策略就是限速,严查超载,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将事故苗头扼制在萌芽状态。第二是消防安全。

以前的社会安全常指社会治安,这种传统安全观念现在多少有点儿过时。一是环境条件的改善,使得社区、里弄甚至楼栋时刻处于摄像头的严密监控之下,犯罪分子作案成本大大增加;

二是居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已经普遍大大提高,犯罪分子盗、扒、抢、伤害的成功率很低。

但另一种安全——食品安全,逐渐提到了社会安全的首要地位。

众所周知,春节是人民大众探亲访友、交流集会的高峰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中国人特有的好客习俗,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番是不可避免的。在毒奶粉、地沟油……一再泛滥市场的今天,食品安全形势从来都没有如今这么严峻。要想确保老百姓吃上放心油、放心菜,还要有市场监管、卫生防疫和市场管理部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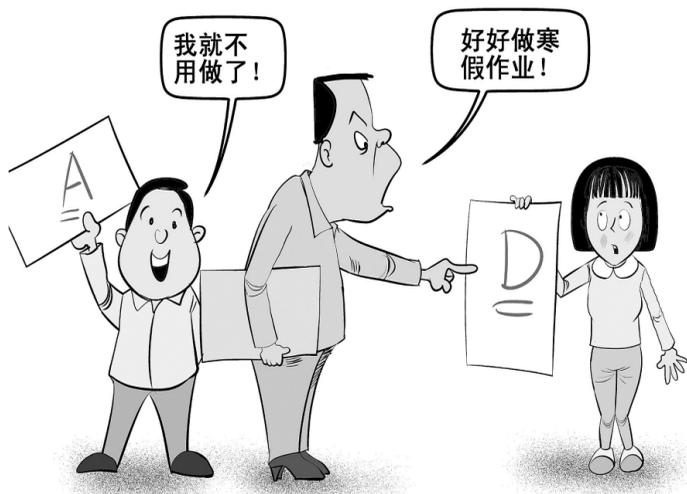
每年春节都有燃放烟花爆竹不当、使用炊具不当造成火灾事故危及社会安全的事情发生。起因都不是故意,但都起于疏忽。

在民俗文化一天一天繁荣的时候,除了政府大力倡导、宣传环境安全意识外,每个市民都要主动积极地配合,自发养成环境安全习惯。要知道一个烟蒂、一点火星这类源于一举手、一投足的不良习惯,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破坏一方安宁,毁灭一生幸福的罪魁祸首。

总之,过一个祥和的春节,需要每一个你的参与。

汪红光

# 因材施教



寒假来临,山东一初中学校的学生领到了一个特别的作业清单:凡期末考试为A的学生,这种(寒假生活)可以不做。一些家长表示,这样做是把孩子的作业分了等级,孩子心理不平衡;一些没考好的孩子也觉得自己的寒假不比考得好的同学过得舒服。

焦海洋/图

# 代表约官员“求解”应成常态

据《新京报》报道,1月15日上午,吴守伦、高扬和吕清等三位人大代表约见北京市住建委的负责同志,为选区一停运电梯“求解”。两个小时的约见交流后,三位代表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停运两年半的电梯“下周应该就能开起来”。

代表约见官员解决的是一电梯停运的小事,可是,这一“小事”的社会价值却不小。

代表反映选民的诉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可以提出议案、建议,可以提出批评意见等,但直接约见官员,就选民的诉求和反映的问题直接与主管官员交流沟通,无疑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北京三位人大代表为电梯成功“求解”的事例再次证明,根据选民诉求,约见官员直接解决问题,是代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值得推行。

在代表与官员的“零距离”沟通中,民众的诉求能更加快捷地“传递”到政府主管部门;而在和代表面对面交流中,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可以对选民关心的问题,更加有清醒的认识。实践证明,代表约见官员,效果往往会“立竿见影”,既督促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又能得到及时解决。

其实,选民有难题民意代表约见官员反映选民诉求,这是很多国家民众诉求解决的常见机制,也是这些国家信访问题不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美国每个议员一年内要在选区内活动70~90天,听取选民的意见和要求,然后以不同方式约见政府官员,督促有关部门解决选民提出的

问题。无论是在选区还是在国会,选民都可随时要求约见官员,约见官员根据选民要求随时约见主管官员。正如美国一位前众议员在谈到自己的角色时所说,他们是“选民的信使,职业介绍所、营业推销员、退伍军人的朋友,概括地说,地位低微者的看护人”。

虽然,外国的制度我们不必照搬,但有些有益的做法却值得借鉴。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民众的诉求需要科学、快捷的渠道予以反映。如果能建立起“选民—代表—官员”的诉求反映和解决的常态机制,当下的信访困局也定会有很大改观。

当然,代表约见官员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求解”的应当是选民的普遍诉求,而不能掺杂个人利益,尤其不能干涉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目前,有个别代表在“两会”时把涉及个人企业的案件,直接交给司法机关负责人要求解决,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如果答复不满意就会投反对票,这种做法也与人大代表的职责和身份不符,必须坚决抵制。

不过,总体来看,人大代表和官员“短兵相接”,当面“求解”的情形还不多见。希望更多的代表,能够从为选区停运电梯“求解”这样的小事做起,积极争取、维护选民利益,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代表约见中,相关部门的官员也表现不错,充分体现了对代表履职的尊重。希望今后有更多政府部门及官员尊重代表的权利,满足民众的诉求。如此,形成更加良好的官民互动、沟通局面,也就不难。

京文

# 文化发展的“微观力量”

这种杂之于群众的“微观力量”,在各地催生出文化发展繁荣的独特模式,即政府推动与“微观力量”良性互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无缝对接。在吉林东丰,政府组织几十名农民画作者到长春参观学习,把农民画产业纳入到全县发展规划中,并聘请优秀的农民画作者到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工作,农民的创作激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在云南永仁,政府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乡村T台”,打造成为“云南省民族服饰文化展示馆”,并将彝族刺绣销往国内外,使这场延续千年的文化盛宴富庶、又乐民。

《易经》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人文”化成的“天下”,是你,是我,也是他;文化,从来都不是与你我无关的逻辑体系、理论框架,而是“我们的文化”,骨髓里的东西。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无限丰富的源泉。文化强国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微观力量”;不仅是精英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是草根文化的自然生长。

这种杂之于群众的“微观力量”,在各地催生出文化发展繁荣的独特模式,即政府推动与“微观力量”良性互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无缝对接。在吉林东丰,政府组织几十名农民画作者到长春参观学习,把农民画产业纳入到全县发展规划中,并聘请优秀的农民画作者到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工作,农民的创作激情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在云南永仁,政府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乡村T台”,打造成为“云南省民族服饰文化展示馆”,并将彝族刺绣销往国内外,使这场延续千年的文化盛宴富庶、又乐民。

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制度设计、政策供给、经费支持等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而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从自在到自觉,从自发到自觉,喷涌出强劲的“微观力量”,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源头活水。群众的内生激情与政府的外在激励携手起来,演奏出文化发展的动人乐章。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13亿颗心一起跳动,就能使“微观力量”转化为“宏观力量”,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农民自发组织的艺术团在田间地头恣意歌唱,“农工图书馆”在“漂流点”向人们提供书籍,城市社区的文化俱乐部如雨后春笋遍地而起……神州大地,遍地生长着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微观力量”,社会管理者当珍视并善用这些“微观力量”,使之成为迈向文化强国的重要引擎。

李拯

# 有道德底线会活得更踏实

由于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道德滑坡”像一道醒目的警示标语矗立在公众面前,使得很多人对未来焦虑不已。而同时又有许多事实证明,世道人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拾金不昧的威海物业工人戚道昌为这个判断又增加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56岁的戚道昌,失业之后再上岗,月薪不足千元,平时捡拾废品补贴家用。面对唾手可得的近十万元现金,他做出了归还失主的抉择。对此,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城市中清贫生活的戚道昌显然比大多数人更缺钱,他平时捡废品也是为了增加一点收入。但是,捡到钱的戚道昌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只是怕失主过不好年,也不愿因为这笔钱让自己心里不安。

如今让很多人感到取舍艰难的选择,其实原本不需费思量。把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钱还给失主,这不就是做人的底线吗?自古至今,无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变迁,类似拾金不昧的道德准则都是深入人心的。以不越道德底线的原则做人做事,不需要赴汤蹈火,也不需要舍己救人,往往只需要举手之劳。如果有人做不到,只能说明他的内心已经被欲望占领。或许他也不想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堕落,于是总想找一些开脱之词,把道德底线的失守归结于权力或制度因素。他可能没有以权谋私的机会,但他会想办法以其他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比如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这种眼光朝下的攀比只会把道德的底线越拉越低,最终使自己无所顾忌。

与城市中的大多数人相比,戚道昌的日子都是紧巴巴的,为了改善生活,甚至不惜去捡废品。戚道昌的可贵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困难一味地归咎于别人,更没有眼红别人的财富。他老老实实地做自己。捡到的大钱他不要,失主回馈的小钱他认为可以,这正坚守了“取之有道”的古训。无论别人议论社会风气怎样不堪,事实上戚道昌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以行动启迪世人,无论是自己的困难,还是别人的不义,都不是自我放纵的理由。如果对社会道德有太多的不满,那么就应该以更严格的标准反求诸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周边。社会风气从来都不是某个人能败坏的,但是每个人的努力的确有助于整体环境的好转。

虽然拾金不昧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戚道昌这样的纯朴、善良依旧需要呵护。让好人有好报,固然需要制度和法律的庇护,但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温暖。捡到钱的戚道昌能一分不少地交还给失主,打工谋生的对方除了道谢,还想到拿出一部分钱表达心意。这些很温暖的细节都能激发人心向善的力量。比起健全的法制和缜密的监控,这种互信反而能给人更多的安全感。

正如“小说悦事件”中的各种路人不能证明社会公德沦丧,拾金不昧的戚道昌也不能证明社会风气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种种让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只能证明当下的社会风气既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好。道德标准的差异性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当不少人徘徊于道德标准的两极之间时,公众更需要明确一条道德的底线,像戚道昌那样坚守不渝。

沙元森

# 回家之路为什么会这么难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让“恐归族”开始纠结。一份调查显示,“恐归”的理由除了传统的经济、事业、婚恋等压力的原因外,假期太短以及组建家庭后回农村过年不适应等因素所占的比重也在增加。(1月16日《楚天金报》)

每到过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回家,最愿说的一个词语也是回家。此时,一年的忙碌全都要放下。过年回家,回家过年。似乎什么都挡不住回家的路。回家,是亲人在远方的一声呼唤,也是游子内心最温暖的悲伤。带着亲朋好友真心的祝福回家,带着给亲人的礼物回家,带着一路平安回家,带着万分欣喜回家。别离和牵挂,最后以一颗心终于到家而达到圆满。

“恐归族”的关键点在“恐”,在面临回不回家的选择时,既恐慌又恐惧。“恐归”既有个人因素,但多是由民生艰辛而产生的心理情绪。“恐归”心理折射人生喜怒哀乐,折射当下社会多元文化的碰撞。可以说,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说得清也道得明的种种重压力催生了“恐归族”。买票难“恐归”,人情消费压力大“恐归”,路途遥远“恐归”,说到底,多数人还是因手头太紧而“恐归”。有的人,还集中了经济、事业和婚恋多方面问题所形成的“恐归”心理。

年年春节,年年就有个回不回家的难题。过年是过滋味的,“恐归”却是把一个年过成了苦味。过年是过心情的,“恐归”却是把一个年过成了心理折磨。“恐归”是落寞,是愁绪,是挥之不去的烦恼,甚至是人生挫败感带来的疼痛。回家陪父母过年是种最寻常的愿望,而在“恐归族”这里,却成了求之难得的奢望。

对于离家在外的人而言,过年过的不是“年”本身,而是过年的时候能够回家的心理感觉,能够体验一种合家团圆的氛围。春节是习俗,还是说不同的人生百味。万家灯火初上时,离家在外的人,只有回到自己的家,看到父母欣慰的笑容,在外漂泊的疲惫才可以完全抖落,积了许久的孤独和苦闷才可以在那种喜庆的气氛中被慢慢融化掉。这就是回家的意义,这就是在过年过年的时候所能抓住的最真切的感觉。

今语